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 唐远清 吴 雷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9)02—0009—3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历史新时期。在4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尊重人民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回顾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经验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2018年12月18日在京隆重举行。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丰富和发展了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迁,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挑战,出现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对今后进一步做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

改革开放是党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贯穿于改革开放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①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②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③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

强调,各级党委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各部门的领导权。^④

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强调,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原则和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始终牢牢坚持,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⑤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并指出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掌握在手中。^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⑦

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证明,任何时候始终坚持抓好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放松,确保改革开放的统一领导和正确方向,这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条件和关键所在。正是因为我们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对一切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并步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新征程,告别“封闭僵化的老路”,杜绝“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历史进程中,以高度的

【作者简介】唐远清,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吴 雷,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8KDBL054;北京市社科基金研究基地2017年重点项目“融合背景下北京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7JDXCA001。

政治自信和定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和现实困难,实现了4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确保了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

二、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取向,尊重人民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根本的利益,这是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宝贵经验。马克思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⑧这句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说服力不仅来源于其理论本身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要充分体现对人的价值和民众利益的尊重,意识形态建设不能脱离了物质生活条件,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

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⑨在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期盼和现实需要。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谈到,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⑩邓小平强调,要始终保持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以最广大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逻辑重心和核心价值取向。江泽民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路线。”^⑪胡锦涛立足“以人为本”,针对我国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指出,我们要着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努力兴办人民群众希望办的实事好事。^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⑬

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党一直努力将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与实现人的发展、满足民众利益诉求结合起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当性和说服力,这也是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习近平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都是在坚持用人民立场指导、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40年来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取得,无不是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凝聚广泛共识,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气取得的。

三、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千差万别,但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因而“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⑭指导思想的一元性,这是古今中外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规律。而在当代中国,这“一元”就是代表了最广泛人民群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去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探索的首要经验,也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和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⑮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⑯而改革,必须依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左”的错误的、僵化教条化的思维桎梏,全面纠正错误,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对科学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科学认识,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在改革开放之初思想价值多元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我们党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江泽民在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强调,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⑰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宣传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加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的建设和管理,妥善处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反复强调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并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文艺、新闻舆论、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实际情况和突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他强调,“我们要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②此外,习近平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③这一论断,也正是基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继承与创新统一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之中,有助于我们能够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排除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的干扰,进一步巩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改革定力信心,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

四、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与创新中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创新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滚瓜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之成就,离不开从理论、内容到话语与时俱进的创新驱动。

在理论创新方面,我们党长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以及新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回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在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的时代课题中相继形成的。这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思想成果,消除了思想疑虑,凝聚了改革共识,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成就了40年的辉煌历程。

在内容创新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历届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系统化理论,起到了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指引方向的作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包括思想建设、道德建设、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纪律教育等许多方面,对此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强调“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⑤要“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泽民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⑥“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⑦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道德水平滑坡,在承继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党中央提出我国居于主导地位意识形态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的十八大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积极倡导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话语创新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话语老化、僵化、苍白的现象,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着力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针对性、实效性。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⑧可见,这“三种文化”是我们党推进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理论源泉。

近年来,我们党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吸收当代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立足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我们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孕育的革命文化出发,从时代命题中不断概括提炼富有时代感的新概念和话语。

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覆盖面上,我们一方面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时、度、效,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另一方面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跨文化交流,增进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流理解,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造福沿线国家人民。■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下转第39页)

下的熟人社会正逐渐解体,借助各类自媒体,迫切释放表达权和信息生产力的公众不再“自扫门前雪”。从2014年起北京朝阳区群众陆续举报吸毒、嫖娼的明星,协助警方破获多起案件,导致一众明星的原有人设崩塌、标签撕毁,朝阳群众的出镜频率与蹿红速度直线飙升,印证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福柯笔下作为规训手段之一的“层级监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而随着社会生活逐渐走向网络化,如今这一金字塔式的监视模式逐渐扁平化,上至国家领导人,中至意见领袖,小到普通公民,都被覆盖在监视和围观编织的越来越密的网格中,无处遁逃。线下的在场监视、线上的“不在场”的在场围观,无处不在的监视和围观的眼睛形成一股合力,让现实社会和虚拟空间的围观者和被围观者在“规训与惩罚”的警醒中自我约束,谨言慎行。从社会治理方面来看,网络围观通过互联网这种高维媒介具有的保留与还原现场的能力掌握事态信息,扮演舆论监督的角色,在网络围观中形成的舆论压力支配事件的议题走向,促使媒体、政府等及时介入事件,从而助力于舆情事件的解决。

四、结语

从全景敞视监视到全民网络围观的这一转变,根植于固有的社会矛盾,也离不开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专业意见领袖的一呼百应和网民心理的催化。网络围观受到互联网本身具有的隐蔽性、多元性、互动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的影响,又呈现出监视方向分化、监视界限消解、监视过程动态化、线上线上监视形成围观合力等特点,相应地也会带来道德绑架、精神审判、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伦理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对网络围观进行引导,注重发挥其正能量。

在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监狱中,无论管理者是否到位或者缺位,犯人们都假定它的存在,因而不得不接受外在控制,同时也自觉地规训自己。全民网络围观

下产生的是一批拟剧理论视域下的囚徒和演员,基于表演人类学视域的观照,“囚徒”和“演员”在社会舞台上你方唱罢我方登场。在网络围观的警示作用机制下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呈现自己,表演的成分居多,所以当网络事件发生时,网民需要剥去虚伪的外壳,理性围观,避免成为被裹挟的乌合之众。赫伯特·斯宾塞认为:“真正自由的减少,是因为表面上的自由的增加而造成的。”互联网时代观点的公开市场越来越大,意见的自我修正却姗姗来迟。网络环境鱼龙混杂,网民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对社会公共事件的监督和管理还需社会矛盾的解决、相关法律的完善、意见领袖的正面引导以及网民数字媒介素养的整体提高等。■

参考文献:

- ①②[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 ③郑根成:《网络围观的伦理审视》,《伦理学研究》2017年第2期。
- ④赵晓明、罗宏梅:《从“看客”到网络围观的演变分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 ⑤吴阳、李晓红:《网络围观的伦理思考》,《理论导刊》2018年第2期。
- ⑥任祥:《网络围观的形成机理与应对策略分析》,《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1期。
- ⑦张淑华:《试论网络围观的舆论监督功能及其发生机制》,《现代传播》2012年第9期。
- ⑧⑨张婷、刘进军:《全景敞视理论视角下的网络直播》,《传媒》2018年第2期。
- ⑩赵江源、晏艳琴:《网络围观的正负效应及其引导》,《编辑之友》2015年第5期。
- 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⑫喻国明:《社会话语能量的释放需要“安全阀”——从“全景监狱”到“共景监狱”的社会场域的转换说起》,《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9期。
- ⑬郭帅师:《瞭望塔与囚徒——福柯“全景敞视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投射》,《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年第3期。
- ⑭《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76页。
- 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 ⑯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0月11日。
- ⑰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 ⑱《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 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 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3页。
- ㉑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3版。

(上接第11页)

第342页、第365页、第128页、第141页、第150页、第367页。

③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第116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⑤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3年12月5日。

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⑦⑬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3版。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⑪⑰⑱《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第335页、第400页。